

农村娃上中国名牌大学的故事

马远征

(接上期)我们哲学系6班办了一个不要厂房、不要设备的汽水厂。班里派陈武光等人到王府井

大街购买碳酸氢钠、柠檬酸、香精、糖精等原料,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在宿舍门前按比例用凉水、

开水配制成各种香味的汽水,装瓶加盖后就成了汽水。当时学校正挖游泳池,大热天大汗淋漓的

同学看见汽水,蜂拥而至,一抢而光,生意好得很。

走出校门

想要学生接触实际、了解农村情况,仅在校园内是不行的。后来哲学系领导组织学生到郊区劳动,有时干一上午,有时干一天。有一次,几个系的学生到西郊玉泉山附近的农村劳动,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一个黑人,是美国留学生,大高个子,黑脸白牙。农民没见过黑人,村里大人、小孩子、妇女成群结队跟着看。这个黑人叫怀特,大大咧咧的,满不在乎。

由于这种劳动方式太短暂、太零碎,后来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,学校又组织了两次时间较长的劳动。第一次是到十三陵水库。早上从北京坐火车到十三陵附近下车,步行到住地。到了住地,我们十多个同学住一起,地上铺些草,打地铺睡觉,天不

就起床吃饭。我们的房东家里两口子,男的看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,我们叫他大哥,女的看着年纪稍大,我们叫她大娘。我们这样称呼他们,他俩不搭理,也不答应。后来我们一问,才知道他们是两口子,北京土话称两口子为“姑母俩”,就是“公母俩”的意思。这件事告诉我们,不调查研究就要犯错误、闹笑话。

干活的那一天,天灰蒙蒙的,我们吃了早饭,便带着窝窝头、咸菜步行到工地。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,挑担、推车、装卸沙石,忙得不可开交。一天中午,我们正在吃午饭,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来到工地,站在我们面前。他戴着眼镜,上身穿一件深蓝色的褂子,慈眉善目,和颜悦色,给人一种亲近感。我们喊:“郭老好!”郭沫若向

我们招招手,说:“同学们好!”我们送给他一个窝窝头,他啃了一口。工地上解放军战士看见郭沫若都大声喊:“郭老好!”郭沫若回答:“解放军万岁!”群众看见郭沫若都喊:“郭老好!”郭沫若也回喊:“人民万岁!”

通过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,培养了我们的热爱劳动的品德。

第二次是参加除“四害”——消灭麻雀活动。为了消灭麻雀,北京市进行了全民总动员,在市区和郊区每一个角落都布置人员,用各种方法吓唬麻雀,不让它停下来休息,迫使它们不断地飞,从清晨一直飞到傍晚,活活累死。我们分在去清河的路边,离圆明园很近。我在村南头,分包的地段有一个厕所,里面长了一棵大榆树。这天我站在路旁,看见一群麻雀

落到了榆树上,于是赶紧拿起一块石头投了过去,麻雀吓飞了,但从厕所里急急忙忙跑出一个手提裤子的男子。他问我:“往厕所投石头干什么?差一点没砸我头上!”我忙说:“树上落了一群麻雀,我砸麻雀呢!没想到厕所里有人,对不起!”我这么一说,那人便不生气了。

1957年秋天,我们有十多天参加除“四害”活动。我们先到农村场院里扒麦秸垛捉老鼠,扒了一个又一个,没有找到一只老鼠。由于我们只会扒开麦秸垛,不会垛麦秸垛,农民不满意,但也没有办法。除“四害”花费时间最多的要属捉麻雀,后来又给麻雀平反了,说麻雀不是害鸟,是益鸟。上级的瞎指挥弄得我们既荒废了学业,又干了不少荒唐事。

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

实践出真知。深入群众,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体察民情,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感情。1958年8月,学校把哲学系学生下放到远离市区的石景山人民公社西黄村大队。我们6班下放到两个村,一个是大井村,一个是金顶山村。我下放到金顶山村,班里十多个人分住两家,我们这组住在村党支部书记王保田家。这家3口人,王大爷、王大妈和女儿王小花。他们家独门独院,在村子最东头第一家,3间平房坐北朝南,西间王大爷3口住,中间是客厅,东间有一个火炕,我们住,烧炕的煤火就在炕下面。

我们在大井村住下不久,公社便把劳动力按军事化编制编成班、排、连、营,主要任务是深翻土地。凌晨3点就吹军号、集合队伍,摸黑干活,用铁锹翻地,要求达到一尺半的深度,干了好大一会儿才见日出。一天三顿饭都在地头吃,晚上打夜战,我们一天仅休息三四个小时。为了赶进度,追求“多快好省”,学习河南的“撕开肚皮吃饱饭,鼓足干劲大生产”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高产”,公社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腾地,把正在生长的庄稼砍掉,用牛拉犁翻地,牛拉着犁子前面走,人跟在后面捡,有不少红薯、花生被埋了起来,并没有收到家,这叫“丰产不丰收”。

我们大多数同学咬着牙,苦苦坚持着。有一位同学出生在大

城市,从小娇生惯养,不愿意参加劳动,每逢打夜战,他便头昏,不一会儿就昏倒了。我们把他拉到医院做体检,医生悄悄对我说:“他没有病,身体健康着呢,是装病。”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每劳动一天,就在黄泉路上迈进了一步!”他还说:“农民的缺点比1958年大食堂的苍蝇还要多。”与这位同学相反,大井村有一位“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条子”,记不住他的名字了,我们称呼他王大爷。这老头有50多岁,因为脚大买不着鞋,常年光着脚干活。在劳动间隙,他经常学着北京评剧名家新凤霞的腔调唱刘巧儿,“刘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,他的名字叫赵振华”,一会儿又自编自唱“刘巧儿我生性慢,我爱吃北京的炸酱面”,大家听了哈哈大笑,为他鼓掌。这位开朗、乐观的王大爷,群众叫他“光脚丫”。

有一天,我跟随大兵团作战队伍住在西山八大处的第二处,在西山脚下,离这不远处有一座寺院,里面住着和尚。我渴了想找口水喝,于是就走进寺院。院子里有一位老和尚,我便叫:“老大爷,找口水喝吧!”这位和尚说:“我们不兴叫老大爷,这是凡人的称呼。”我问:“应该怎样称呼?”他说:“叫师傅。”我叫了声“师傅”后,他便给我倒了一碗开水。大兵团作战结束后,上级组织评选劳动模范,通过层层推荐、评选,我被评北京市石景山人民公社劳

动模范。

大兵团作战结束后,我们又回到了大井村,仍然住在村党支部书记王保田家。有一天深夜,王保田的女儿王小花得了急性肺炎,呼吸困难,危在旦夕。当天夜里王保田外出开会不在家,王大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我急忙抬张小床,让小花躺上,然后和谢道顺、陈武光、周久义等人抬着,跑着送到离村最近的亚洲青年疗养院急诊室。经过医生抢救,小花转危为安。从此,王大爷王大妈总是念念不忘,说我们救了他们的女儿。

当时正在吃大食堂,吃饭不要钱。这天晚饭是渣子粥,就是玉米、豆子、红薯混在一起煮的稀饭,我一连喝了3大碗。我们十多个同学睡在东间的炕上,炕中间位置临近煤火口,非常暖和。大家说:“你怕冷,你睡中间位置吧!”到了半夜,我披上大衣跑到院子里解小手,刚解完小手,觉得一阵头晕,躺在了地上。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,冷风一吹,我醒了。我赶快跑进屋里,喊道:“都起来!都起来!”把大家叫起来。他们起来后又是呕吐又是头晕。王大妈也起来了,

拿出一盆腌酸菜的醋汤子让大家喝,说醋能解煤气中毒。经过一番折腾,大家慢慢头不晕了,恢复了正常,都说是我救了他们的命。

我们在大井村住了大半年,与农民结下了深厚情谊,谁家有了喜事,我们一同欢乐,谁家有了难事,我们尽力相助。1959年春天,我们要回学校了,村里在王大爷家里开了个欢送会,村民谈谈我们给村里带来的新变化,我们谈谈在这里受到的教育。最后,我们请多才多艺的崔文琴唱《送别》:“正月里正月正,十五挂红灯……八月里是中秋,十五的月光明;大妈对我们真关心,送来月饼……”从正月一直唱到十二月,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。我们含着泪水,依依惜别了大井村,回到了学校,开始了紧张而又有序的大学生活。(完)

壮丽70年
奋斗新时代

——讲一讲我们自己的故事